

永恒女性的魅力

——维拉和卡捷琳娜形象经典评论质疑

金亚娜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重新评价俄国古典文学中已有定论的两位女性形象(《当代英雄》中的维拉和《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 指出其永恒女性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 女性; 永恒女性; 爱情; 宗教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在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类女性形象, 她们的生活目的和全部生活内容就是爱情, 她们为爱情而生, 为爱情而经受各种人间悲剧, 并随时准备为爱情献身, 在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或爱情理想破灭时, 她们或者轻生, 或者进修道院, 或者采取其他极端的措施。这样的女性在妇女尚无社会地位、未获精神解放的时代尤其普遍。此类女性形象比比皆是, 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的玛莎·米隆诺娃, 《茨冈》中的真妃儿, 《巴赫奇萨拉喷泉》中的萨列玛, 《村姑小姐》中的丽莎, 《杜勃罗夫斯基》中的玛莎等;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贝拉、梅丽和维拉;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丽莎, 《阿霞》中的阿霞;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卡列尼娜; 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太太》中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海鸥》中的妮娜·扎列奇纳娅; 列斯科夫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中的卡杰林娜·里沃芙娜·伊兹梅洛娃;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的娜塔莉娅和阿克西妮娅; 拉斯普京的《活着, 可是要记住》中的纳斯焦娜, 等等。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古今俄罗斯文学中十分众多, 我们不过列举一些众所周知并具有代表性的形象而已。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些形象, 以往的评论是否正确和完善, 关于这些女性形象的研究课题是否已经穷尽, 下面对几位女性形象的分析即是对诸如此类问题做出回答的尝试。

可以肯定地说, 无论是人类的哪个时代的哪一种文化, 都崇尚并赞颂高尚美好的爱情, 忠诚贤德的女人——爱的使者永远令人尊敬, 她们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和品格的象征。直至今日, 古希腊爱神维纳斯(阿佛罗狄忒)的美丽雕像还是人类对生命的自然根源的崇拜和对纯洁和谐的女性的理想。而文学作品同其他艺术一样, “把人的生物繁衍本能同最纯洁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 把爱情变得高尚和崇高”。(瓦西列夫 2002: 237) 奥维德在《爱情学》中也曾说过, 爱情需要“甜言蜜语的滋养”, (瓦西列夫 2002: 237) 在这一方面, 艺术语言具有强大的魔力。俄罗斯的语言艺术大师们塑造了众多品德高尚、忠于爱情的女性形象, 从而对俄罗斯民族的爱情观及社会风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反言之, 作家在创作这些女性形象时又总要听命于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荷马史诗》中描绘了多么生动的甚至惊天动地的爱情画卷, 与俄罗斯的爱情文化心理却有許多相异之处。“荷马以一种无限的激情和温柔来爱有限的甜蜜的人类生活”, 在他的史诗中“肉体生活的优雅与美, 健康与力量, 唤醒了隐蔽的尊敬

和爱。神和人都是这样。”（古斯塔夫·缪勒 2001：5）而古今俄罗斯艺术家无论在描写女性还是她们的爱情生活时，更重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细节，如广大读者所知，著名的普希金的达吉雅娜究竟长得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因为诗人致力描写的是她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理性的美，这已使女主人公魅力四射并且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这已经足够了。当然，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文学中女性的爱情生活的展示受到东方正教的禁欲主义观念的影响，不如西方文学中女性爱情生活来得潇洒自由。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总体而言，俄罗斯作家给了女性形象足够的人格自尊，这比西方作家所给的多得多，在描写女性的爱情生活时尤其如此，令人感到女性的人格魅力大大超过男性；而西方文学中的许多女性形象，甚至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作为男性的欲望的对象来展示的。这个看法有可能片面，但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作家笔下作为爱的使者的两位女性形象。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有一位女主人公维拉，作者着墨不多，以至别林斯基在评论中说：她“却只能像影子似的，在作者的想像中闪现一下。”（别林斯基 1996：316）并且，别林斯基还对这一女性形象作了十分严峻的批评：“维拉的面貌是特别不可捉摸、暧昧不明的。这与其说是女人，宁可说是女人的讽刺画更适当些。你对她刚刚发生一点兴趣，感到一点迷恋，作者立刻用某种完全不相干的反常行为破坏了你的同情和迷恋。她对待毕乔林的态度近于是谜。有时，你觉得她是一个拥有无穷的爱和忠诚、能够作出英勇的自我牺牲的深刻的女人；有时，你看到她只有软弱，再没有别的什么。在她身上特别可以找到缺乏女性的骄傲和女性尊严的感觉，这些感觉不妨碍一个女人热烈而且忘我地爱，但却决不容许一个真正深刻的女人去忍受爱情的虐待。她爱毕乔林，但居然会再一次改嫁别人，并且还是嫁给一个老头子，因而是按照计算（不管是什么样的计算）而嫁人的；她为毕乔林曾经对一个丈夫不忠，又不忠于第二个，其所以要这样做之故，与其说感情的迷恋，宁可说是由于软弱。她崇拜毕乔林崇高的天性，在她的崇拜中有一种奴性的东西。由于这一切，所以她不能唤起作者的强烈的同情……”（别林斯基 1996：316）别林斯基还认为，“梅丽公爵小姐写得比较成功些。这个少女相当聪明，但也并不空虚无聊。”（别林斯基 1996：316）

对维拉这一人物形象的上述评价一直被奉为经典，所以，在我们文学史的研究中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甚至感到这一形象不屑一顾。如果我们从当今的女性文化及情爱观的视点重新探讨一下这一形象的价值及经典评论，对以往的理论尝试进行一个解构——诠释——重构（建构）的过程，那么，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别林斯基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维拉的形象不可捉摸，是个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不清楚，作者对她的态度接近于“讽刺画”；其二，维拉很软弱，并且只有这一个特点；其三，缺乏女性的骄傲和女性的尊严；其四，她爱毕乔林却嫁给别人，并且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其五，在她对毕乔林的崇拜中有一种奴性的东西。我们抛开主观的意向，从作品的文本来看看，维拉是不是这么一个女性形象，作者对其所持的究竟是什么态度。

维拉和毕乔林曾经热恋过，后来再次在五岳城的矿泉疗养地邂逅。《当代英雄》的“梅丽公爵小姐”这篇故事一开始就向读者交待了这对情侣的爱情生活背景。从毕乔林与维拉见面时的旧情复发的情景，我们立即便能猜出维拉是个非同寻常的女性：“听到这个可爱的说话声时，久已淡漠的神魂游荡一下传遍了我周身的条条血管……”（莱蒙托夫 1994：90）如我们所知，对于情场老手、心如铁石的毕乔林，这种爱的激情决不是随便哪一个旧情人都能引起的。虽然维拉已经第二次嫁人，他们重逢时感受到的炽烈爱情甜蜜如初，尽管维拉承认：“从我们相识的时候起，除了痛苦以外你（指毕乔林）什么也没有给过我……”（莱蒙托夫 1994：90）由此可见，毕乔林与维拉的爱情不是一相情愿的，并且有其非世俗的深层原因。

维拉一出现在作品中，从文本本身看，她的形象是清晰而确定的，这是一个身患重病的柔弱的女人，但依然用生命爱着自己所爱的人。她的爱执着而无私，她以此赢得了毕乔林的忠诚和爱，如毕乔林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她没有逼我起誓永不变心，没有问我们分手后我是否爱过别的女人……不过我也不会欺骗她的：她是世界上惟一我所不能欺骗的女人。

我知道我们很快又会别离——而且也许是永别：我俩将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步入棺材；但是对她的回忆将原封不动地留在我的心中……”（莱蒙托夫 1994：90）当维拉的身影消失在灌木丛和山岩的背后时，“我的心就像头一次别离时那样，病态地缩成一团。”（莱蒙托夫 1994：90）然后，毕乔林飞身上马，满怀着激情和爱的冲动向草原奔驰而去，一种已经变得陌生了的欣喜若狂的感觉重又在他的心中升腾起来。可见，维拉和她的爱对“一半灵魂已经死去”的毕乔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她是惟一让毕乔林体验到温暖和依恋的人。然而，维拉对毕乔林的爱并非缺少女性的尊严和女性的骄傲。这要从问题的本质来分析，结论如何对于评价维拉这一形象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维拉对毕乔林的爱情产生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她爱毕乔林身上的什么东西。如维拉在给毕乔林的信中所说，“一个女人一旦爱上了你，她看待别的男人就不会不怀有一些鄙薄，并非因为你比他们好，噢，不是的！而是你的天赋之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惟你独有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在你的声音中，无论你说什么，都有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威严；无论谁都不会如此天长地久地希望别人爱他；无论谁的凶相怒言都不会那么让人动心；无论谁的青睐都不会给人以那么多的欢乐；无论谁都不会像你那么自如地运用自己的优势，无论谁都不能像你那样实实在在地不幸，因为无论谁都没有像你那样，如此不肯尽力劝说自己相信与自己相反的看法。”（莱蒙托夫 1994：149-150）维拉这段对毕乔林的爱的告白，十分清楚地说明，她是在对毕乔林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至诚地爱着他的，她感受到这一杰出贵族青年高于他人的天赋和可以引以自豪的高贵男性气质，他的威严，特别是他因与贵族社会的流俗不能认同而陷入的孤独和不幸。维拉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普通女人，她能够洞察毕乔林的内心世界并且理解他各种古怪恶作剧背后的痛苦，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始终不渝地忠实地爱着毕乔林时，她没有听从当时为人们所接受的女性叙事，她的女性的人格面具已经解体剥落，她所追求的是爱和被爱，在这种感情生活中，她没有放弃对爱的需求和行为的自主权。维拉是独立自主的，没有把自己变成男性的欲望的对象，这已经是女性的人格自尊。如果理论家从男性的立场出发，不自觉地用男性的标尺来衡量女性的行为，那么就只有用缺失性的概念来描绘了。其实，爱是女性品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一个女性在满足自己的爱欲时，是否把自己当做爱欲的主体，是否有她的自我情结。维拉爱毕乔林，完全是出于她的真实情感，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和交易的成分，其中确实有她对毕乔林的崇拜。即使这种崇拜中含有某种“奴性”也无可非议，因为从“崇拜”的宗教来源而论，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前者总是要听命于后者，那是否也是一种奴性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维拉对毕乔林的崇拜正是女性气质的聪明灵秀和对男性的依赖顺从？也许正因为如此，毕乔林同维拉才能相爱相知并成为互相不能缺少的朋友。当毕乔林得知维拉要离他而去时，立刻“疯疯癫癫”地飞身上马去追赶她，“冷酷无情”地抽打着这匹已经筋疲力尽的马，想要见到她的念头“重锤似地敲打着”他的心！他希望只要能给他一分钟，让他再看维拉一眼，握一下她的手，同她告个别……毕乔林又是祈祷，又是咒骂，边哭边笑，无论怎样都表达不出他的不安和绝望。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当永远失去维拉的可能就在眼前时，她在我心中变得比普天下的所有东西都更珍贵——贵过生命，荣誉，幸福！”（莱蒙托夫 1994：149-152）当他的马在他的抽打下，因疾驰过度而倒地死去时，他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一头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像个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久地躺着，“——任眼泪流淌和大放悲声而不加克制。他感到胸膛就要撕裂，他所有的刚强、冷静都如同烟消云散般地消失了，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试问，失去一个缺少女人骄傲和自尊的女人的爱怎么会使毕乔林产生如此巨大的悲伤和精神震撼？这个事实本身就应该引起我们对维拉这一女性形象的特别关注。不能忽略的是，维拉是惟一对毕乔林了如指掌的女人，包括他的所有缺点和品行不端的恶习，然而她依旧深爱着他，毫不动摇。若是我们细细地品味毕乔林的人生悲剧，也许可以把他同维拉的爱情视为他不幸人生的一种慰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以一种赞美和崇敬来看待维拉对毕乔林的女性的包容和无私的爱。失去这种爱使毕乔林更深地陷入了虚无，使他更加玩世不恭，表面

上看，他似乎变得如道家一样豁然，“天下万物，祸福相随，否极泰来！”（莱蒙托夫 1994：152），实际上，他的感情变得更加冷漠，灵魂更加枯竭。

这就是一个用整个生命来挚爱的女人的精神力量。她没有贪图什么，也没有索取什么，即使她的身心太柔弱，也不该承受严酷的批评。若是人类完全没有了这样的爱，那才是不可想像的悲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中一位备受关注和赞许的女性形象。众所周知，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十分赞许卡捷琳娜对卡巴诺夫家道德观念的抗争，并且最终以投河自尽实现了自己最后的反抗，所以杜勃罗留波夫把卡捷琳娜称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评论家还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性格，它首先令我们赞叹的是与一切恣意妄为的针锋相对，它是感情强烈而果决的，直接忠实于对自然真理的敏锐感觉，充满了对新理想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Н.А.Добролюбов 1979：250）中国的戏剧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强调了卡捷琳娜的反抗性格和她的死所发出的抗议。（温祖荫 1983：207—209）

近年来，有些评论家则把卡捷琳娜这一形象的内涵和价值完全归于宗教，认为“卡捷琳娜这一形象在宗教的狂热中极大的高尚起来”。（П.Вайль, А.Генис 1995：107）

这两种评论各有其片面和有失公允之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从剧作的文本出发，对女主人公的形象力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确定无疑的是，卡捷琳娜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女性形象之一，她感情丰富，富于幻想，渴望幸福，渴望自由，热爱自然，品格高尚，憎恶欺骗和谎言。可以说，这一女性形象集中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许多可贵之处。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这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并未在“黑暗王国”的晦暗生活画面上投射一抹光辉，始终未能挣脱令她窒息的樊笼，也未能获得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幸福，不过是成了黑暗王国的牺牲品。就连她的投河自尽也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震撼。其实，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篇评论对卡捷琳娜的性格分析过程来看，杜勃罗留波夫把这一切看得十分真切，只是出于激进的思想，得出了过于社会思潮化的结论，并且，他这样做还因为缺少应有的神学意识。

卡捷琳娜出生在一个小市民^①的社会阶层中，生活环境庸俗乏味，她也没有受过应有的文化教育。但她在家中生活得如小鸟一般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母亲对她宠爱有加，把她打扮得像个漂亮娃娃。这种生活环境使卡捷琳娜自幼酷爱自由，性情刚烈、自主，桀骜不驯，不受任何外力的约束。如她自己所说，在她6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的人惹恼了她，虽然天色已晚，她却跑出家门，跳上小船向伏尔加河中划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人们才在伏尔加河上10俄里以外的地方找到她。即使是这样，卡捷琳娜还觉得人在地上的生活不够自由，总想长上翅膀飞到天上去。她幻想着像蝴蝶一样随风飞到田野上，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这种对自由的梦幻般的追索贯穿了她的一生。

然而，卡捷琳娜却被嫁给了一个富商的儿子，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自私的懦夫；而婆婆是个专制独裁的女暴君，视儿媳为女奴，对她十分专横肆虐。这个愚昧而又冷酷的家庭剥夺了卡捷琳娜作为一个女人和妻子的爱和被爱的一切权利，使她的各种美好憧憬都化为乌有，也使她的心灵枯萎、窒息。就是在这种压抑、苦闷的境遇中，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鲍里斯。富有浪漫情怀和感情丰富的卡捷琳娜把这种新的爱情关系看做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指望从中得到周围人所不能给予她的理解和同情，为此她甚至准备同鲍里斯到天涯海角。但她没有想到，这种爱情对鲍里斯不过是一个生活插曲，他并没有准备把自己的命运同卡捷琳娜联结在一起。抛开问题的这一方面不谈，单单这一私情本身已经使卡捷琳娜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因为她不愿隐瞒什么，也不会说谎，但又摆脱不了对鲍里斯的恋情。她苦苦地挣扎在妻子的义务和情感斗争的旋涡之中。卡捷琳娜最终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意愿，在丈夫外出之时，背着婆婆与鲍里斯幽会了10个夜晚。而正是为了这短暂而虚幻的快乐和幸福，她付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

卡捷琳娜最终之所以做了这种决绝的选择，不外乎受三种因素的促使，其一是宗教信仰

的误区；其二是险恶的人文环境；其三是刚烈不屈的个性。正是这三种力量把卡捷琳娜推向了伏尔加河的无底深渊。

从《大雷雨》的剧本我们得知，卡捷琳娜自幼生活在东正教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中，童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宗教情绪。这正是她的宿命。还在少女时代，卡捷琳娜就十分喜爱宗教活动，最愿意到教堂去做祈祷，把祈祷当做理想的生活方式，并且她富有宗教的神秘灵感，甚至连做梦都梦见天堂的树和天堂的山，金色的教堂和美妙的花园，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歌声。如她自己所说：“你知道吗，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教堂顶上撒下一束光柱，其中烟雾缭绕，犹如彩云，我常常看到似乎有天使在其中飞翔并唱着歌。”（А.Н.Островский 2000：224-225）每当走进教堂时，卡捷琳娜就觉得像是进入了天堂，忘记了一切人，也忘记了时间，甚至觉察不到仪式何时结束，似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卡捷琳娜怎么会这样。平日里，她常常在深夜起来，跪在墙角里一直祈祷到天明，或者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她就到花园里去，跪在地上祈祷，一边痛苦流涕，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事祈祷和为什么哭泣。并且，一种莫名的神秘不解的东西总是令她感到恐惧，不祥的预感总在折磨她，甚至常常引发她对死亡的幻想。

如果从上述宗教情绪就做出卡捷琳娜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卡捷琳娜虽然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也粗通一些教义，但她毕竟生活在小市民的圈子里，如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中所指出，她从小就习惯了周围人的固有观念，无法摆脱，并且没有受过高深的理论教育。不仅如此，她也没有深入地学习东正教的教理，对教义一知半解，从云游派女信徒、女圣愚（贵妇人）和周围的人们那里接受了许多违背东正教的异端邪说，这一切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迹，使她逐渐失去了快乐的幻想和对理想的高尚追求，心中充满了对黑暗神秘力量的恐惧和罪恶感。在她产生了对鲍里斯的恋情以后，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预感死亡即将来临。在她看来，大雷雨预示着上帝要对她作出的严厉惩罚，教堂墙壁上画的地狱之火更加剧了她的恐惧，加之，周围的人们愚钝而又守旧，充满了迷信和恐惧，对卡捷琳娜的行为极为愤慨，他们向她投来异样的目光，对她的不守节窃窃私语，她感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绝路。

作为一个东正教的信徒，上帝的子民，卡捷琳娜如果真是虔诚的信仰者，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她应无条件地听从上帝的诫命和教诲。按照上帝的律法，妻子不可背叛丈夫，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如果妻子同他人有了性关系，就被视为淫妇，并且“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主权在丈夫”（《圣经·哥林多前书》7：4）“不可再让罪支配你们的身体，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你们顺服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圣经·罗马书》6：12、16）卡捷琳娜在与鲍里斯的关系方面显然是没有听从上主的“义”，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按照教规，她自然是犯了罪。卡捷琳娜清楚地知道，宗教不能容忍这种罪过，她必将受到严厉惩罚并蒙受极大的耻辱。但这种对宗教和上帝的惩罚的理解是很片面的。《圣经》中讲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众所周知的故事。耶稣“回到圣殿，群众都来寻找他，他就坐下，开始教导他们。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她是在行淫时被抓到的。他们叫她站在中间，问耶稣：‘老师，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们，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他们想用这话陷害耶稣，找把柄挖告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过这话，他又弯着身子，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一个一个溜走，从年纪大的先走，只剩下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女人。耶稣就站直起来，问她说：‘妇人，他们都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她说：‘先生，没有。’耶稣说：‘好，我也不会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圣经·约翰福音》8：1-11）由此可见，上帝不仅为人制定了律法，他还要救赎人的灵魂，只要真心悔改自己的罪过，上帝会用他的爱来拯救人，使人改变心意，走上正路。卡捷琳娜只知道《旧约》中的律法和惩罚，不知道《新约》中的救赎，所以她认为，人犯了罪只有死路一条。她决定一死了之。岂不知，她这样做更加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的生命和肉体都是上帝赐予的，人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身体是“为主而存在的。”（《圣经·哥林多前书》6：13、15）

卡捷琳娜的做法实际是对上帝的挑战，所践踏的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律法。卡捷琳娜按照自己人本性的欲望，犯了上帝的律法，这是因为她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这种黑暗也进入了她的灵魂，使上帝的光无法照亮她心中的黑暗，使她不能得到生命的光，只能在黑暗中行走。按照教会的要求，她本应该虔诚地向上帝忏悔，通过祈祷和在苦难中的磨砺让自己的灵魂重新与上主合而为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持的信仰。卡捷琳娜却想让上帝给予她的身体和尘世生命消失，以求解脱，这显然是对上帝的背叛。她投河自尽的行为所彰显的不是虔诚的悔过，而是对上帝指引的光明之路的背弃。这就是说，卡捷琳娜的宗教信仰是很肤浅的、表面的、不彻底的，含有许多杂质，真正主宰她的灵魂的是她本性中的原生自然力，是她的刚烈个性和女性的人格自尊。所以，宗教信仰并没有使这个形象变得崇高起来，宗教的因素也没有为这个形象增加光彩，形象的审美和伦理价值更不能由此得到提升。这个形象的宗教意义在于，它告诉信徒：“在关闭了通向上帝之路的地方，打开了精神灭亡之路。”(М.Дунаев 1997: 257)

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我们也无须为卡捷琳娜最终选择的轻生喝彩，因为这不是对“黑暗王国”的胜利，而是被逼无奈所作出的牺牲。善良的天性使她不能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加害于人，就像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那样杀死所有有碍她爱欲释放的人。在“黑暗王国”的强大势力的重压下，尚未从愚昧中走出来的卡捷琳娜只好彻底地、永久地逃亡了。她这样做，实际上只求得一种结果：她的人性美与“黑暗王国”对她的肆虐同归于尽了。这是“黑暗王国”中女性理想的破灭，也是女性美的幻灭。周围的人们甚至认为卡捷琳娜的死是罪有应得，是她惟一的归宿。这使“黑暗王国”更加黑暗，原本透出的一线女性美的微弱光辉也完全熄灭了。而就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却出现了奥尔迦·伊丽英斯卡娅和叶莲娜·斯塔霍娃这样的进步新女性的形象，这样的女性才为腐朽黑暗的俄国社会带来了一线光明，她们的出现，为女性指出了一条冲破牢笼走向自由并获得独立人格的光明之路。可见，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实在是太从政治需要出发，很有硬性拔高和借题发挥之嫌。

就卡捷琳娜这一形象的艺术特点而言，它也没有那么高的现实主义价值，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它还具有古典主义的一些特征，是类型化的形象，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一以贯之，在剧中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自始至终都反映出宗教的狂热和对罪过、惩罚的恐惧。

不过，总体而言卡捷琳娜的形象还是十分美好的。它与维拉的形象都充分地体现出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品格——对爱情、幸福、自由的渴望和无功利的执着追求，真诚、自尊和充满诗意的高尚心灵；他们在生活的紧要关头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按心灵的吩咐去做一切，虽然她们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战胜脆弱的心，但她们都是无比真诚的。所有这一切，可能就是俄罗斯哲学家所说的“永恒的女性”罢。

“永恒的女性”其实就是夏娃的长存特性，因为女性都是夏娃的后代。这就是对爱和被爱的生生不息的追求和为此作出的无私奉献。

附注

①小市民是俄国 1755—1917 年间的一个社会阶层，指手艺人、小商人和房产主，社会地位低于商人。(本文作者注)

参考文献

- [1]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С] 1979 М.
- [2] Петр Вай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нис 1995 Родная речь [М]. М.
- [3] Островский А. Н. 2000 Гроза, М.
- [4] Дунаев М. 1997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3 [М]. М.
- [5] 瓦西列夫 2002 情爱论 [М],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 [6] 古斯塔夫·缪斯 2001 文学的哲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7] 别林斯基 1996 文学的幻想[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8] 莱蒙托夫 1994 当代英雄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9] 温祖荫 1983 世界名剧介绍与欣赏[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10] 圣经·哥林多前书。
- [11] 圣经·罗马书。
- [12] 圣经·约翰福音。

Doubt about the Classic Comment on Images of Vera and Catherine

JIN Ya-na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evaluate mainly two female images with final conclusion in the Russian classic literature —Vera in “A Hero of Our Time” and Catherine in “The Thunderstorm”, and point out where their charm of the eternal female lies.

Key words: female; the eternal female; love; religion

收稿日期: 2003-10-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000ZDXM740012)

作者简介: 金亚娜: (1941—),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 现任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刘 锐]